

思想的前提批判：“做哲学”的一种路径选择

孙正聿

摘要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做哲学”的首要前提是厘清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独特的活动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重大的基本问题”的“哲学”，既不是以“思维和存在”为研究对象，也不是以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理论任务，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批判地反思构成思想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敞开了“做哲学”的广阔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

关键词 做哲学 哲学的基本问题 反思 思想的前提批判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21.05.002

“做哲学”的前提是“有哲学”。如果没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哲学”的人类活动，就提不出如何“做哲学”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做哲学”。面对现代哲学的“拟科学化”或“拟文学化”的两种取向，我把“哲学”理解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将其阐释为一种“做哲学”的路径选择。

一、“做哲学”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一种游戏，可以而且应当有多种玩法。“多种玩法”是“一种游戏”的“同中之异”，“一种游戏”则是“多种玩法”的“异中之同”。如果没有“多种玩法”，这种游戏就会失去引人入胜和持久存在的生命力；如果不是“一种游戏”，多种玩法就会变成面目模糊甚至让人生疑的“另类”游戏。因此，在诉诸“多种玩法”的“游戏”中，人们总要不断地追问其何以是“一

种游戏”。何谓哲学？哲学何为？就是对哲学的“异中之同”的追问。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应当并且肯定有自己的独特的活动方式，也就是区别于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其他“基本方式”的活动方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就会把“哲学”混同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以追问哲学活动的“异中之同”为标准，现代哲学所尝试的“拟科学化”或“拟文学化”，就不是以“多种玩法”赋予哲学这种“基本方式”以生命力，而是以质疑“哲学”作为“一种游戏”即“一种基本方式”的可能性而“消解哲学”和“终结哲学”。

现代哲学所尝试的“拟科学化”或“拟文学化”的路径选择，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奇思妙想”，而是“时代的产物”。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及其技术应用，日益深刻地变革着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理解，由此对“哲学”提出的最为严峻和最为尖

锐的问题就是：如果人类有效地解释世界的方式只能是“科学”，如果人类的现代世界图景只能是“科学的世界图景”，如果人类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实践活动只能是遵循“科学规律”，那么，人们对世界的种种哲学解释不都是“理性的狂妄”吗？人们所描绘的种种哲学图景不都是“语言的误用”吗？人们所设计的种种哲学理想不都是“虚幻的乌托邦”吗？这样的“哲学”不是应当而且必须予以“治疗”“消解”乃至“终结”吗？哲学还何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而存在呢？

在现代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以语言的两种职能为出发点对“哲学”的质疑，就是具有标志性的对“哲学”作为“一种游戏”或“一种基本方式”的挑战。在他看来，人类把握世界的“语言”具有“表述”或“表达”的两种基本职能，因此，人类只能是或者以语言的“表述”职能而陈述经验事实，或者以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展现情感意愿；前者构成的是“表述”的“科学”，后者构成的是“表达”的“艺术”。卡尔纳普由此提出：如果“哲学”试图承担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又不能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事实，就只能是“给予知识的幻象而实际上不给予任何知识”；如果哲学试图承担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又不能像“艺术”那样“表达”情感意愿，则只能是一首“蹩脚的诗”^①。这表明，卡尔纳普以“语言”的两种职能为立足点的挑战“哲学”的逻辑，不仅“拒斥”了作为“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而且“封闭”了现代哲学的“拟科学化”或“拟文学化”的路径选择，因此在实质上“拒斥”和“封闭”了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可能性。由此提出的最为严峻的问题就是：在哲学的“多种玩法”中，是否存在某种“异中之同”，并且可以将这种“异中之同”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顽强地坚守“做哲学”的当代哲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二、哲学的“异中之同”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探寻哲学的“异中之同”，追究哲学何以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有一个至关重要和不可回避的切入点，这就是恩格斯所指认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究竟是哲学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是全部哲学活动中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哲学活动是否具有“异中之同”的回答，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哲学能否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回答。具体言之，如果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它就只是某些哲学家或某个时代的哲学家特别关切的问题，而不是决定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活动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不是决定全部哲学活动的“异中之同”的问题；反之，如果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并不仅仅是哲学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它就绝非只是某些哲学家或某个时代的哲学家特别关切的问题，而是决定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活动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决定全部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异中之同”的问题。由此提出的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哲学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何以成为哲学的“异中之同”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人类的全部活动可以归结为“知”与“行”，即在观念中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和在行动中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存在于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和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全部过程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活动——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从实质上说，就是在“知”和“行”中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既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又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仅仅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是必须予

^① 参见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以追究的更为重大和更为艰难的理论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与人类全部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密不可分的；然而，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何以成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症结，又恰恰在于哲学以外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并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人们才能以思维规律把握存在规律，才能以思维规定表述存在规定，才能构成具有客观性的关于世界的思想，这是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意味着，对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取向：一种思维取向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致力于以思维规律把握存在规律、以思维规定表述存在规定，从而构成关于世界的各种思想；另一种思维取向则是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对象，致力于反思构成思想的“前提”。在前一种思维取向中，并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予以反思，恰恰相反，它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前提”而形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后一种思维取向中，则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为“前提”而形成关于世界的思想，恰恰相反，它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予以反思，探究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基本方式”的特殊理论性质、独特的活动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即它与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其他”基本方式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哲学以外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并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样的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致力于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正因如此，存在于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哲学以外的“其他”基本方式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从而“反思”蕴含于人类全部活动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之中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是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独特的活动方

式和特有的社会功能，也就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最为本质的规定性。

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相互关系上看，哲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就具有双重含义：它是哲学的“专业”，但不是哲学家的“专利”。哲学的“专业”，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批判地反思构成思想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引导时代性的思想观念变革和文明形态变革，从而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由于哲学反思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隐含于人类全部活动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基本方式之中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动和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中总要以“哲学”方式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又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这表明，从“专业”而非“专利”的双重含义去理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既能够真正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何以只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又能够真正理解哲学何以渗透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中，从而实现其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社会功能。

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而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厘清这个问题，是理解“哲学之为哲学”的重大问题。人们之所以把哲学的“世界观”解释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把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视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由此把“思维”和“存在”视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进而把提供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作为哲学的历史任务，从而导致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在这种理解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研究对象的“整个世界”与“各个领域”的关系，是理论内容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而不是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的关系，即不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的关系。从这种理解出发，“哲学”就只能是作为“科学”的“延伸”或“变形”而存在，只能是把自己变成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

的“科学”。这种理解,模糊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真实内涵和真实意义,也就是模糊了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特殊的理论性质、独特的活动方式及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因此,理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必须澄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原则性区别。

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思维和存在”的问题,其后果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概括性和最大普遍性的“科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则会把“哲学”混同作为“实证科学”的广义的“思维科学”。哲学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离开对脑科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的“概括”和“总结”,然而,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却不是“表述”以思维规律把握存在规律的机制和过程,也不是“研究”人的认识如何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追究人的认识“何以可能”,批判地揭示构成思想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人类究竟以何种信念为前提而构成思想?人类究竟以哪些“基本方式”而构成思想?人类究竟以哪些“基本逻辑”而构成思想?人类究竟以哪些“基本观念”而构成思想?人类究竟以怎样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构成思想?正是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中,在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中,在对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中,哲学才成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才成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才成为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的活的灵魂”。

三、“反思”的哲学与“思想的前提批判”

在哲学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不仅明确地以“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去反观整个哲学史,把“思维的不淳朴”视为近代哲学的出发点,而且在与“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的对比中提出哲学的“思辨思维”,明确地把“反思”指认为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以黑格尔的“反思”为出发点而探寻哲学的独特的理论性质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对于深入理解哲学把握世界的独特的“基本方式”,是至关重要

要的^①。

“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对思想的思想”。黑格尔提出人类思想活动中的“反思”,这意味着,“思想”本身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也就是如何在思想中实现思维规定与存在规定的“统一”问题;二是“反思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把“思想”本身作为对象而予以批判地考察。由黑格尔的“反思”而引发的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则是:哲学作为“对思想的思想”的“反思”,究竟“反思”的是什么?这应当是深究“哲学何为”或“如何做哲学”的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哲学意义的“反思”,并不是对“思想内容”的反思,而是对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的反思,也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对“思想内容”的反思,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不可或缺的活动方式;对“思想前提”的反思,则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的哲学所特有的“反思”。思想的前提,既不是作为思想内容的思想,也不是作为思想活动的思想,而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人的任何思想,都蕴含着构成自己的前提。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既是哲学反思的实质性内容,又是哲学反思的艰巨使命。哲学反思的艰巨性,就在于思想前提所具有的“隐匿性”、“强制性”;哲学反思的必要性,就在于揭示和批判“隐匿”于思想之中的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哲学反思的现实性,则在于思想前提所具有的“可选择性”和“可批判性”;作为思想前提批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则在于思想前提的“普遍性”。

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它作为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的操纵者”。这意味着,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虽然深深地“隐匿”在思想的过程与结果之中,但它作为思想中的“看不见的手”和“幕后的操纵者”,却深层地规范着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即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规范着人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具有“隐匿性”的思想前提对构成

^①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39页。

思想的“强制性”。比如,在“常识”范围内,我们必须遵循“经验”的方式去构成思想,任何“超验”的思考,都是对“常识”的“挑战”;在“宗教”的范围内,我们必须遵循“信仰”的方式去构成思想,任何“背离信仰”的思考,都是对“宗教”的“挑战”;在“科学”的范围内,我们必须遵循“逻辑”的方式去构成思想,任何“违背逻辑”的思考,都是对“科学”的“挑战”。同样,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和各种特定的理论框架中,我们都必须以这些基本方式以及这些理论框架提供的基本原则为思想的前提,并依据这些思想前提去形成思想。这就是思想前提对构成思想的“逻辑强制性”。

思想前提的“隐匿性”和“强制性”,构成了哲学反思的必要性。这就是,只有通过哲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才能超越对思想内容的反思,进而达到对构成思想的前提的反思;也只有通过对构成思想的前提的哲学反思,才能揭示出“隐匿”在思想的过程和结果中的“前提”,并以哲学批判的方式去解除这些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从而使人们解放思想,赋予思想以新的概念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进而创立新的思想。

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可能性,首先是因为任何思想的前提或思想的任何前提都具有“可选择性”。从文明史、思想史看,思想的前提总是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构成思想的特定过程和特定结果中,构成思想的前提是确定的,不可变易的,因而它的逻辑强制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的思想领域中,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又是不确定的,可以变易的,因而它的逻辑强制性又是应当和可以解除的。这意味着,构成思想的任何前提,既不是“绝对之绝对”,也不是“绝对之相对”,而是“相对之绝对”,即时代性的绝对性与历史性的相对性。思想前提的二重性,要求在对思想前提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对思想前提的“否定的理解”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自身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理论思维和思想内涵同样具有历史性,因此,哲学的“反思”就包括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在“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哲学的逻辑强制性同样是应当和可以超越的,时代性的哲学同样是作为“相对之绝对”而存在的。

24 天津社会科学 2021年第5期

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可能性,还因为任何思想的前提或思想的任何前提都具有“可批判性”。思想的前提在思想的过程和结果中是“隐匿”的,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哲学的反思去揭示这些隐匿的前提,对这些前提进行“思辨”、“分析”或“解释”,使它们以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审美标准和终极关怀等方式而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哲学史之所以是派别冲突的历史,并展现为哲学思想的“厮杀的战场”,就在于哲学在思想的前提批判中不仅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及其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中所隐含的思想前提,而且直接地指向哲学自身所隐含的构成思想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对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是最深层的思想前提批判。

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其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统一,在于思想前提的“普遍性”。在人的思想的过程和结果中,思想前提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这种思想前提的“普遍性”,既构成了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必要性(任何思想都“隐匿”着需要揭示和批判的“前提”),又构成了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可能性(从任何思想中都能够揭示出予以批判的“前提”)。以“思想”为对象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四海为家”,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思想的“前提”具有普遍性。

思想前提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因此,以思想前提为批判对象的哲学反思,就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揭示思想内容中“隐匿”的“前提”,即从哲学反思的思想维度去揭示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使思想的前提由“幕后的操纵者”变成“前台的表演者”;二是以哲学反思的逻辑去审视这个走上“前台的表演者”,迫使它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解除以原有思想的逻辑支点构成思想的逻辑“强制性”。哲学反思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批判性”,是“哲学”的“本性”;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则是“做哲学”的实质内容和根本使命。

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不是纯粹的思想的结果,而是以人类生活的历史发展为坚实基础的。按照马克思的概括,人类的存在方式已经和正在经历两种基本形态:一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存在,由此造成的就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人对物的依

赖性”的存在,由此造成的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①。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构成思想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前提批判。近代哲学的前提批判,主要是对“上帝本体论”的批判,即对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批判;现代哲学的前提批判,则主要是对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的批判,也就是对“尘世”中的各种文化样式的批判。人类进入21世纪,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在内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日益迅猛的变革,不仅作为“非神圣形象”的“资本”仍然是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社会根源,而且作为“非神圣形象”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造成人的存在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新形式的“自我异化”。当代哲学正在对“文明”的深切反思中,重新理解以“文明”为核心范畴的思想观念,重新阐释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在内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思想前提”。从近代以来的哲学史看,正是在对构成思想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前提批判”中,哲学历史性地揭示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历史性地实现了人类的观念变革和文明进步。这是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根基之所在。

四、“思想的前提批判”与 哲学活动的理论空间

构成思想的前提,主要包括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基本观念和哲学理念,因此,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即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即对形式逻辑、内涵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即对常识、宗教、艺术和科学等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即对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理念、主要范畴、重要命题等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即对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这五个方面的前提批判,从

总体上构成了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论空间。

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承诺“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这是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因此,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直接地就是对“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条件的前提”的批判,也就是对哲学自身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前提批判。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以“思想的客观性”为聚焦点,不仅探寻外部世界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突出地反思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知情意与真善美等一系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这种对“思想的客观性”前提批判,决定了哲学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三者一致”的理论性质。

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思维和存在是否“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问题。因此,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不仅指向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且必然指向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即“思维规律”的前提批判,并具体地表现为对思想的外延逻辑和内涵逻辑及其实践基础的前提批判。辩证法作为“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集中地体现了从批判地反思思想的外延逻辑再到批判地反思思想的内涵逻辑,从而构成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正是这种前提批判的辩证法,构成了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理论形态。

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人的思想活动不仅遵循思维规律,且是以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等,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也就是人

^① 引文分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人类的全部思想,人类所形成的全部世界图景,都是由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所构成的;离开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人类就无法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就无法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因此,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必然包括对构成思想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在思想的前提批判的意义上,哲学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不仅揭示了构成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得以形成的各种基本方式,而且揭示了这些基本方式及其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世界所隐含的人类自我意识,从而为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

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构成思想的前提,最为普遍地表现为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即人们用以构筑思想的存在、世界、历史、规律、发展、真理、价值和自由等基本观念。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进步,总是以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先导;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门学科的“新见解”,无不集中地体现为该门学科的“术语的革命”,即赋予该门学科的核心观念和基本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当代哲学的诸种方兴未艾的“部门哲学”,诸如科学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它们之所以不是某门“科学”而是关于某门科学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其实质内容和社会功能无不是对构成思想的各种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为人类活动和各门学科的基本观念不断地“清理地基”,展现了哲学的思想前提批判的开阔的和开放的思想空间。在思想的前提批判的理论空间中,具有直接的生成性和历史性的思想前提,就是构成思想的各种基本观念。

五是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每个时代的思想,都隐匿着构成其自身的基本观念,并深层地表现为作为“时代的真理”的哲学理念。因此,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就不仅仅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基本逻辑、基本方式和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而且深层地指向对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哲学对自身构成思想的基本理念的前提批

判,就是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寻经验常识的根据,反省历史进步的尺度,询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就是追究通行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变革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整个生存方式,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思想前提的批判,主要注重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形成哲学反思的自觉,也就是形成一种自觉的前提批判意识,不停滞于对思想内容的反思,而是深入到对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二是注重揭示思想中隐含的前提,也就是注重在“灯火阑珊处”发现和提出真正的哲学问题;三是“消解”思想前提的强制性,也就是以逻辑的力量去摧毁已有逻辑的强制性;四是修正和转换构成思想的前提,以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去建构思想的新的逻辑支点、实现思想的逻辑层次的跃迁,从而为人类的思想活动提供新的“操作平台”。

人类的历史活动,总是以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而规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又总是以批判性地反思和创造性地重构思想的前提而引领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从而塑造出新的时代精神和实现文明形态的变革。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不仅只能是“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而且必然是在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中实现哲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是行进中的哲学活动,而不是某种完成了的哲学理论。人类正在途中,哲学正在路上。我把“哲学”理解为“思想的前提批判”,可能是偏颇的甚至是偏执的,所以,我以“做哲学”的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来看待和阐述我所说的“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研究”(项目号:19ZDA01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孙正聿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赵景来